

大正初期的涩泽荣一与中国

涩泽荣一与中国的交往，从明治初开始经大正年代至昭和初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早在 1877 年 1 月，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总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赴上海与清政府进行借款谈判。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1931 年 7 月，91 岁高龄的涩泽躺在病床上，为他亲手创立并一直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所编撰的《支那近代的政治经济》一书写下长达千字的序言，为他终生关心的中国留下了最后的文字。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 50 多年里，作为领军人物，涩泽积极促进日本财界与中国的联系，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本文考察大正初期涩泽荣一与中国的关系，探讨他在日本财界对华扩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浅析其中国观的形成及其变化。

一、日本财界对中国的扩张与涩泽荣一的作用

从政策的连续性来看，大正初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里包含着很多明治时期日本财界对华战略的内容。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财界的中国扩张面临两个严峻的课题。一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围绕中国市场上的争夺日益尖锐化，二是中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反日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涩泽荣一积极展开对美和对华的民间经济外交，以摆脱财界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探讨 1909 年日本实业家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1912 年有关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设立的构想和 1913 年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过程的三个案例，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梳理明治末年到大正初期日本财界与中国的关系和涩泽荣一的作用。

1、明治晚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

明治晚期，如何加强与中国实业界的联系已成为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1909 年 6 月，日本实业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将近两个月的访问，就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的重要举措。迄今为止的有关研究从辛亥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角度，从日本民间经济外交的视角，以及访华代表团的组成与访华过程为考察重点。¹ 这些研究注意到日本实业界在中日关系中

¹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木村昌人《涩泽荣一——民间经济外交的创始者》中公新书，1991 年。中村

的作用，为理解多重结构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视角。本文使用新发现的史料揭示代表团于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的秘密协议，披露明治晚期日本财界计划成立日清实业家联络组织的新事实。从财界对华政策的角度，阐明涩泽荣一与赴清实业家代表团的密切关系，探讨日本实业家代表团在财界对华政策上的意义。

日本实业家代表团是由日本财界领袖涩泽荣一向政府提议而组建成立的。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事实。以往的研究未能注意到代表团的组建与涩泽荣一的关系，因此不能把日本实业家代表团访华一事同财界的对中国政策相联系。1908年，中国南部地区抵制日贷的浪潮汹涌澎湃。在中国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面前，日本财界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涩泽荣一则认为“实业的发达取决于国与国之间在生意上互通信息。还要清除彼此的各种障碍，同时要致力于相互往来，而且这种往来不应仅仅限于个人之间，还需要组织一种团体，以求疏通思想，或者合作某种事业，这是20世纪的时代要求。”³基于这种思考，他提出首先要开展与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流。按照涩泽最初的想法，先访问中国再去美国。⁴但是由于同中国的联系不顺，只得改变计划，先去美国再访问中国。1909年9月1日到11月30日，涩泽荣一率大型日本实业家代表团赴美国视察。1910年6月，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博览会的名目，日本实业家代表团踏上了历时近两个月的访华旅途。原计划由涩泽荣一为团长，可是由于在访美期间过度疲劳，医生希望涩泽休息，最后请日本邮船社长近藤廉平代替了涩泽荣一出任团长。⁵

义《关于赴清实业团》早稻田大学亚州太平洋中心《社会科学讨论》126第43卷第2号，1997年等。

² 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中国访问》。129页。

³ 《东京商业会议所日报》第3卷第7号，1910年7月19日。

⁴ 木村昌人前引书，175页。

⁵ 代表团由商业会议的干部组成，其成员如下：团长日本邮船会社长近藤廉平，团员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土居通夫，横滨商业会议所会头大谷嘉兵卫，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东京商业会议所付会头大桥新太郎，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龙川办三，各古屋商业会议所付会头铃木总兵卫，横滨商业会议所特别议员永井久一郎，三井物产会社理事福井菊三郎，日清汽船会社取缔役白岩龙平，京都商业会议所议团员岛津源藏，东京商业会议所书记长白石重太郎，团长

加强日清实业家的联系和邀请中国主要实业家来日访问以及筹划日清共同合作的事业是代表团访华的三个主要内容。⁶在访华最后一站的上海，日方代表近藤团长一行同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等人讨论了设立日清实业家联络组织《同方会》的计划，并达成秘密协议。为防止泄密，在访华结束后编辑出版的访华团记录中故意把这一天的日程改为自由活动。⁷这或许也是该计划封尘至今的缘故吧？然而，设立《同方会》计划是代表团访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涩泽荣一长期以来设想的日中实业界提携合作的最重要的一步。⁸

该计划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一计划是由日本向中方提议，得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全面协助。⁹其次是该组织《同方会》的会名。“同方”为同居东亚之意，也是日中实业家交流的原点。“志同道合”（《礼记·儒行》），儒学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说法。第三，会则中明确写入排斥第三国的条文。第四，这个组织将来还要在实业方面合作。¹⁰总之，《同方会》的目的第一要牵制美中实业界的接触，同时也要为拓展中日两国实业界合作的内容和领域建立基础。7月19日，涩泽荣一在迎接代表团归来的仪式上致词，他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同方会》计划，但是高度赞赏代表团访华的成果，反复提示团员们应该考虑“如何要把画饼变为实物，只有东西进

随员日本邮船会社西乡午次郎，随员川村景敏。赴清实业团志编纂委员会《赴清实业团志》1914年，2—4页。”

⁶ 日本外交史料馆档N03-1312，《日清实业家访问交换》外，野泽论文，120页。6月16日，驻南京日本井原领事在致小村外务大臣〈实业团度清的结果，两国商人之间有望成立联络团体组织的计划〉的电报中指出“将来以举办日清博览会为契机，考虑成立日清商人间的联络团体组织，该计划有成功可能”。《日本外交文书》第43卷第2册，417页。

⁷ 这一天，代表团的日程为自由活动，近藤团长等赴苏州观光，前引《赴清实业团志》177页。

⁸ 6月17日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举办了欢迎代表团宴会，并在致词中说“日中两国有必要考虑加强两国商业上的关系和联络的方法。”6月20日，近藤廉平团长，松方幸次郎和白岩龙平抵义昌成商会干部叶子衡宅，与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李平书、王一亭进行了秘密的协商。1912年7月，白岩龙平访问上海时，再次与中方代表协议，决定日中双方共同成立中华五星有限公司，日本代表为日本实业团代表近藤廉平，中国代表为中国实业团代表周金箴。契约书共十二条，分中日两种文字。

⁹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小村外务大臣电报，1910年6月21日，外交史料馆〈日清两国实业家联络机关设立文件〉。

¹⁰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小村外务大臣电报，1910年6月28日，同上。

入胃中方能成为滋养体力的营养品。”¹¹显然，涩泽示意代表团成员要尽快把计划落实在行动上。

其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该计划一度中断。1912年7月，在白岩龙平的努力下，以该计划为蓝本制定了“同方会则草案”，以日中合办的形式决定设立“中华五星有限实业公司”。这一日中实业家联络机组织的构想，在日中实业家之间建立交流团体的原初意义上，无论从其名称、组织形态还是具体内容细则等方面都如实地反映了财界的对华思考。另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内田外务大臣报告，同一时期三井财团也在策划同类计划。这一事实说明，在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如何取到中国实业界的协助，建立一个不同于欧美的，具有东洋特色的中日实业界之间的联谊实务团体乃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当务之急。¹²这些计划代表了涩泽等日本财界领导对开辟中国市场的基本思路。

明治时期，以涩泽荣一为领导的日本财界在向中国扩张的过程中，战略上采取经济参谋本部的思考，战术上利用合办企业方式，同时在理念上宣传经济亚洲主义，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部署。但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财界的对华政策和扩张，主要以战争为媒介，政治上依存政府由财阀打头挺进，并不具备实现涩泽荣一上述对华构想的前提和基本条件。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给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涩泽荣一推行他的对华政策带来很大的可能性。

2、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的爆发为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带来了新的转机。很多日本财界人士关心政治变动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关注革命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变化对日本的影响。1911年10月25日《东洋经济新报》发表了“清国革命与日本的态度”“深刻骚乱的经济影响”，社论，指出“今般革命的经济影响，利弊相共受之最大者乃我日本”¹³，这种观点

¹¹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6卷13页。

¹²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报《关于日支两国人合办事业机构》。在支那方面的关系者中，三井一派已经以上述同样目的设立了朝日商会，为此考虑到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希望与非三井该派外结合。

¹³ 社论指出“没有比战争更消耗物资的，换言之，战争就是增加物资的需要。在此场合，最处有利地位的就是我国”。

反映了财界主流对中国时局的理解。涩泽荣一也认为中国革命时期乃日本财界对华扩张的“千载难逢之良机”，呼吁“日下之大商战，支那是战场”。

中国国内新旧体制的更替与变化，使日本迄今为止建立起来的对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中华民国诞生前后，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保持中立观望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提供援助的国家。清政府与革命军方面为了克服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与财政危机，都对日本寄予很大的希望。1911年12月底，孙中山专派代表访问了涩泽荣一、阪谷芳郎、松方正幸、井上馨等日本政界财界要人，急切期待日本政府和财界能在财政方面给与援助。

原日本大藏大臣阪谷芳郎是涩泽荣一的女婿，也是日本财界重镇之一，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阪谷和涩泽两人对孙中山的要求，提出日中共同设立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方案。孙中山接受日方的提案，希望通过建立银行得到日方的巨额援助。该计划关系到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生死存亡，是该时期中日关系上最大的事件。此计划的酿成、完成过程中涩泽与孙中山建立起联系的意义首先是使日本财界走上中日外交的正面舞台。另外，涩泽荣一能够直接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打交道，使日本财界领袖首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建立起联系和信任。对于涩泽来说，孙中山的信任成为他日后开展对华外交的重要政治资源。事实表明，涩泽荣一与孙中山的个人友谊，促成了1914年中国实业公社的成立，也为大正初期以后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民国初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进入了新的阶段。辛亥革命时期日中之间的几个重要的交涉，如中央银行设立构想，铜管山和招商局以及汉冶萍等几项大的借款谈判，其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孙中山同日本之间关于“租借满州”的谈判，也是毫无结果。虽然这些谈判都失败了，但是中日双方建立的联系为日本财界的中国扩张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政治保障，使其在与列强诸国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同时，19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¹⁴。

1914年中日之间成立的中国实业公社是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对华扩

¹⁴ 参见拙著《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御茶水书房，2003年。

张的最大成果。这个会社是 1913 年孙中山访日前后由日方提议，孙中山与涩泽荣一分别代表中日双方成立的中日合资合办企业。中国实业会社的构想，设立及其改组反映了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变化。¹⁵

中国实业会社的筹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全面支持。涩泽荣一按照他与大藏次官胜田主计事前的商议，与孙中山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谈判。胜田在交给涩泽的书函中明确了对此计划“日本政府表面上不参与，但在幕后大力支持”的原则，并表示“本计划由涩泽全权负责”。然而，孙中山对日本政府和涩泽荣一之间的秘密联系和对中国实业会社的定位全然不知，被蒙在鼓里。为了防止孙中山觉察日本政府的幕后操纵，新会社的方案依照胜田的意见几经修改。

1913 年孙中山对日本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访问。访日期间，孙中山得到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与接待，其中财界表现得格外殷勤。涩泽不辞辛苦参加了接待孙中山的所有集会，阪谷芳郎以东京市长的身份设盛宴招待。在辞了大总统后，仍然得到日本各界如此隆重的接待，孙中山感动非常。涩泽鼓吹日中实业界合作与中日友好，引起了孙中山的共鸣。中国实业会社组建期间，中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由于涩泽荣一与孙中山之间建立的信任，中日间最大的合资合办企业才能几经挫折而成立。

如果对公司的章程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实业会社继承了 1907 年的“东亚兴业公司”和 1910 年的同方会的宗旨。从组织形式，经营内容和业务范围来看，后者都是前者的翻版。新会社囊括了日本对华经济活动的主要业务，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重要窗口。

上述三个事例表明，在大正初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中，涩泽荣一的地位极其特殊和重要。在对华问题上，涩泽荣一始终立足全局，注重长远利益，其特点是既有理念又有政策。辛亥革命前后十年是涩泽荣一与中国交往极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日本财界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时期。为了有效地推动财界的对华扩张，涩泽把同方会中关于日中合作部分和日中实业家交流部分，分别纳入中国实业会社与后来成立的日华实业协会中，使两个组织活动的内容和重点各有不同。此外，涩泽还十分注重开拓日中之间的人际资源，注重加强与政治家，文化界人士的联系。从各种

¹⁵ 同上，239 页。

意义上讲，大正初期日本财界在对华政策上的所有进展，都是同涩泽的领导而努力分不开的。

二、涩泽荣一与中国和他的中国观

涩泽荣一是日本最著名的实业家，也是最著名的儒教传道士，这在近代日本社会极为罕见。涩泽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他生于富农之家，年轻时做过德川庆喜幕臣，后来留学法国受自由民权思想之熏陶，明治维新时任大藏大丞，以后又反“官尊民卑”之社会潮流，辞官为商。涩泽一生亲自参与了 500 多家企业和 600 多家社会公共组织的建立与管理，是近代日本的巨匠。¹⁶ 涩泽荣一是日本财界的第一代领袖，长期以来提倡中日友好合作，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更是积极推动两国实业界的交流，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1、涩泽荣一与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涩泽荣一同孙中山建立起的友谊，对于他的一生具有很大的冲击意义。早在幼年时代，6 岁的涩泽受精通汉学与日本俳句的父亲的教育法之影响，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了《诗经》、《小学》、《中庸》与《论语》。7 岁时，他不满足于家庭教育，每天到邻村堂兄处学习两个小时，通读了四书、五经、《史记》与《十八史略》等中国古典。¹⁷ 这些经历在涩泽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常说自己是在儒教思想教育下长大的。1877 年，38 岁的涩泽作为政府的特使赴上海同清国谈判，两年后又邀请清国特命全权大使何如璋到家中做客。他积极交接在东京的中国外交官，经常接待到日本访问的中国要人，一有时间就积极出席关于中国的各种集会，是热心促进中日交流的实业家领袖。但是，他结识孙中山却是在年过古稀的 1911 年 10 月之后。

1911 年底，何天炯拜访涩泽荣一，成为连接涩泽与孙中山友谊的纽带。1912 年 1 月 11 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面临最严峻的危机之时，孙中山致电涩泽，希望他能在设立银行和提供武器方面给予援助，并邀请他访问中国。涩泽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穿梭于财界政界之间。虽然努力没有成功，但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与孙中山之间友情的基础。

¹⁶ 土屋乔雄：《涩泽荣一》吉川弘文馆，1989 年。

¹⁷ 同上，12-239 页。

孙中山也十分尊重涩泽，孙中山直到 1925 年逝世时，一直十分信任涩泽，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家都十分景仰涩泽荣一，把他当作为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财界老前辈。戴季陶、李烈钧、蒋介石、张群等访问日本时，时间再紧，也要拜访涩泽荣一，表示尊敬和友好。这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中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据涩泽晚年的回忆，孙中山同意成立中国实业会社，完全是涩泽荣一劝说的结果。涩泽向孙中山说，“政治上争斗如同黄鼠狼捉迷藏，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投身于实业界好，无论是矿山，还是铁道，只要搞文明的事业，一定会做起来，孙也赞成，俩个人的想法越来越近了。”¹⁸当然，同孙中山的友谊是有前提的。他不能做到毫无保留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作为日本财界领袖，他首先考虑的是日本的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的友谊。而且，作为日本财界领袖，涩泽荣一重视经济发展、并不赞成革命的做法。在谈到中国的领袖时，他赞许的是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有实力。在选择中国实业会社中方股东时，他要求白岩龙平找与政治无关的实业家。考虑到中国政局的动荡，涩泽认为与纯粹的企业家的合作更令人放心¹⁹。

尽管如此，对于涩泽荣一而言，同孙中山的相遇，仍然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成为改变他晚年的重要事件。1916 年，从实业界引退后的涩泽荣一组建了日华实业协会，直到 1931 年逝世，担任会长，大力推动中日两国实业界之间的交流。

2、涩泽的中国观

涩泽的中国观经历了由“中国东洋盟主论”、“支那保全论”、到“日本东洋盟主论”三个发展阶段。

1880 年前后涩泽提出的“中国东洋盟主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强烈。引发了经济界的一场短暂但是波及广泛的争论。事情的由来是，1880 年 2 月，涩泽代表日本经济学协会致函李鸿章，建议将清朝货币本位与日本的圆银统一起来。涩泽在信中提到“贵国疆域广阔，民众物博、主盟亚洲雄处中土，铸币生利，殖货以拓富源”。²⁰这种以中国为亚洲盟主的提法，立即遭到协会内反对的批判，报刊杂志沸沸扬扬，

¹⁸ 明石照男编：《青渊涩泽荣一——思想与言行》龙门出版社版，1952 年，179 页。

¹⁹ 致白岩龙平书简 1913 年 9 月 5 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三，书简一，595 页—596 页。

²⁰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 27 卷 295 页。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涩泽显得有些狼狈，难以招架。从而不得不由阪谷若郎在第二个月的例会上出面替涩泽做了如下辩解：关于向支那李中堂劝说改币一事，现细读其文本及译文，关于译文中的“盟主”等提法近来有文章批判说这是关乎国体大事。其实，作者的本意决非要称支那为盟主，而是如同盟兄吾弟之意，决非关乎国体的大事。一场风波过后，涩泽对类似的提法极为谨慎。²¹

涩泽是日本财界中主张中国保全论的代表。义和团事件时，他说“不管北清事件的结局如何，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希望能保全支那国。不谈瓜分之事，要推进商工业方面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所有商工业者的愿望。”²²他认为从经济利益考虑，瓜分中国后列强诸国会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这将直接威胁日本的对中贸易。另外，从感情和心理上而言，作为儒学家的涩泽，是难以接受中国被瓜分的。

日俄战争后，涩泽也是一个日本东亚盟主论的响应者。涩泽认为要确保日本在东亚的盟主地位首先要从扩大海外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设立海外据点三个方面着手。

涩泽主张日本作为东亚的盟主，首先要大力开发中国和朝鲜的丰富资源，因此必须促进中国与朝鲜在文明方面的进步。同时决不应满足于现有的京釜铁路、京义铁路和长江航线。尤其是在战后，欧洲各国都关注东亚，在各地扩大商权，故日本应不满足于与他们争夺同等的权益，而应有更胜一筹的准备。²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涩泽主张必须重组东亚的贸易体系，使日本成为东亚的中心。

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社会轻视中国之风蔓延。随着同中国接触机会的增多，涩泽荣一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社会道德的堕落。辛亥革命后他说“昨天听到井上博士讲，与以往相比，支那的道德思想明显退步，对此，我也有同感。”²⁴1914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旅行的途中，涩泽在从汉口给阪谷芳郎的信中坦率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进一步认识。“各地之

²¹ 同上，299 页。

²² 《涩泽荣一男爵《不均衡经济的登场》《银行通信》第 177 号、1900 年 8 月《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讲话二，1968 年，290 页。

²³ 从 1895 年至 1911 年，涩泽创建并经营了 14 家与中国有关的企业与组织。1、东华纺织株式会社，2、上海纺织会社，3、日清银行，4、东洋万国株式会社，5、清朝协会，6、湖南汽船株式会社。7、南满州株式会社，8、东亚制粉株式会社，9、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10、日清汽船株式会社。11、满州兴业株式会社。12、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3、日清企业调查会。14、东亚兴业株式会社。

²⁴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讲话二，325 页。

风土人情以及土地之肥沃贫脊、物质之丰富与短，一目了然。总之，是天惠过厚而人功不足。此未加人力之现状则是我国人应注意和努力之处。”²⁵

此后，涩泽荣一也开始主张日本应该帮助中国，同时强调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强调中日两国应重视历史上的友好交流传统，进而建立新的中日合作关系。这是涩泽的中国观与大多数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不同之处。

3、作为儒家的涩泽荣一

明治日本为了尽快实现近代化目标，很多人主张与落后的亚洲断绝关系。对此，涩泽指出为了实现近代化就要脱离亚洲，否定东亚文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论语》是社会的货殖致富的方向。他批判当时的日本社会中有很多人读《论语》之文而不懂《论语》之意。他主张从实业家的角度重读《论语》，发掘其中关于经济的真知灼见。他阐述了仁义王道与货殖福贵之间的关系，认为孔子的根本主张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认为货殖之道是经济之本。在向欧美一边倒的当时的日本社会，涩泽想通过宣传《论语》的思想树立东亚文明的地位。他认为孔子思想即不是时代的遗物，也不是旧道德的残余，而是东亚文明的真髓。他主张作为实业家，应把孔子思想作为行动准则。

整个大正时期，他拿出很多精力投入到宣传儒家思想的活动中，组织成立了很多宣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团体。

涩泽荣一成立的儒教组织以及相关活动

顺 序	名 称	成 立 时 间
1	孔子祭奠会	1907 年
2	阳明学会	1908 年
3	孔子教会	1909 年
4	圣堂保存会	1909 年
5	孔子诞辰会	1912 年
6	曲阜孔子庙参拜	1914 年

²⁵ 同上。

7	《论语》年谱编撰	1916 年
8	财团法人斯文会	1918 年
9	论语复制	1919 年
10	论语	1922 年
11	《论语》汇集	1922 年
12	手写《孝经》	1922 年
13	圣堂复兴成果会	1926 年
14	手写《论语》	1926 年
15	国译《论语》	1926 年
16	信浓尊孔会	1926 年
17	手写《大学》	1929 年
18	宋版《论语注疏》复制	1930 年
19	《论语》与算盘	1916 年
20	涩泽子爵活《论语》	1922 年
21	实践《论语》处世谈	1922 年
22	《论语》讲义	1925 年
23	处世的大道	1928 年

结 语

在思考大正时期涩泽荣一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应该忘记他对 21 条的态度以及他为创立日华实业协会所做的努力。

1915 年 5 月 3 日，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政府发出了 21 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第二天，《中外商业新报》刊登了涩泽荣一的谈话。

“如果诉之于武的话，日本与支那的实业关系会遭到空前破坏，中日实业公司也将在事实上不得不中断其活动。”²⁶ 涩泽非常担心由于两国政府的对立使好不容易走上轨道的中日经济关系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仅隔三天涩泽荣一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7 日大隈首相召集了涩泽荣一等主要银行的代表，通告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要求实业家们协助征集军用物

²⁶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 55 卷、108 页。

资。并对战争情况下的财政状况做了说明。在征求与会者的态度时，涩泽代表大家表示赞同政府的决定。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财界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同日本政府保持一致，在 21 条问题上也是同样。作为财界领袖的涩泽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但是此后不久，在接受《时事新报》记者的采访中，涩泽多次指出日本应该通过这次交涉反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²⁷

这一事实表明当中日两国关系恶化，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时，作为日本财界领袖的涩泽荣一所面临的困窘和苦闷。在大势已定之时，涩泽的选择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个人的涩泽，还是尽了他力所能及的努力。涩泽之所以要创建日华实业协会正是为了尽量避免中日两国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涩泽的中国观中仍然有相当的部分与同时代日本人的对华认识相近。但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儒教方面的深厚造诣使得涩泽的中国认识与理解超越了国境与时空。半个世纪以来，涩泽领导日本财界向中国扩张，积极发展同中国实业界的交流，致力于改善日趋恶化的中日两国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那个时代，涩泽能站出来宣传儒家思想是需要一番勇气的。他呼吁中日两国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加强交流的良苦用心也是难能可贵的。从坚持和平正义，加深相互理解，面向未来推进中日关系的意义上讲，涩泽荣一是超越时代的伟人。他的活动与思想是我们今天思考中日关系的宝贵财富。

²⁷ 出席大隈首相的紧急招待会的涩泽荣一以外，还有三井银行常务取缔役早川千吉郎，十五银行总裁方严、三菱银行部长串田万截，第一百银行总裁池田谦三、安田银行安田善次郎、美津岛日银总裁，志村劝告业银行总裁，志立兴银总裁等。《龙门杂志》第 324 号、第 61 页，1915 年 5 月。